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大众的哲学

——杨春贵同志访谈录

半个多世纪的哲学生涯

采访者: 杨校长,您好!您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请您先简要回顾一下您学习和工作的主要经历。

杨春贵: 好的。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读研究生时期。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不是哲学。1955年考入北大新闻专业,1958年10月,北大新闻专业成建制合并到人大新闻系,在那里又读了一年新闻,1959年毕业。当时中央强调加强理论工作,学校决定在哲学系开办三年制研究生班。而人大哲学系创办于1956年,当年还没有本科毕业生,便从新闻系和法律系抽调了4名本科毕业生读哲学研究生。新闻系选的是我和胡福明。这样,我就又读了3年哲学研究生。这3年,在我的人生道路和理论生涯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话语系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我走上了毕生为之而奋斗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之路。

(二) 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期。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当时哲学系刚从政经系中分离出来,人手比较少,我一人主讲两门课,一门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门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教学的实践,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进一步理解。1962年10月26日,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论文《总的质变过程中也有部分质变吗》,这是一篇学术争鸣性质的文章。

(三) 在广西基层下放时期。“文革”打断了我大学的教学工作。1969年底,天津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下放广西,我的夫名列其中。这样,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便来到位于九万大山的沙池地区沙池县沙池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我被安排到距家56华里之外的地委机关工作,先后担任地区革委会报道组副组长、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一干就是7年。那时经常背着行李下乡采访,多次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有一段时间还驻村同农民一起学哲学、用哲学。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基层干部,使我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中国农民的所思所想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从而在思想感情、思想作风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想问题、发议论、办事情也比过去更务实了。这是一份终身难忘的人生经历,对于我后来在理论工作中比较重视联系实际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改变了党和国家命运,也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天津下放人员只能落户基层的政策开始松动。1977年10月,我被调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参与创办区党委理论刊物《思想解放》,担任编辑。在该刊1978年第四期上,我以笔名“秋实”发表一篇读书笔记《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考茨基脑袋里的木箱谈起》,批判林彪、“四人帮”用引证骗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四) 扎根中央党校。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从全国各地、各部门抽调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充实师资队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978年6月,我被调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当时恰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刚刚开始,我立即投入了这场大讨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三讲的写作,我执笔写了其中的两讲。这些讲稿随后由湖南、山西等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又赶写了一本主题为《认识与实践》的小册子,1980年5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5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成立,我被聘任为第一任部主任。在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主讲“哲学引言”和“哲学串讲”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等课程。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稿》《毛泽东哲学思想新论》等哲学教材。

1993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8月兼任教务部主任。1994年2月任校委

委员,4月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从哲学教学工作岗位转到教学行政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毫无思想准备。我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哲学教研部的。好我在从事教学行政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离开我所钟情的教学工作。当然,教学内容已不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扩展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讲题包括邓小平理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等等。中央党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十分重视,起步很早,影响很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尚未公开出版,我们便从中宣部借来内部使用的“大字本”开始备课,当时叫“十教授集体



杨春贵

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大纲编写组首席专家。

备课《邓选》三卷”。整整一个多星期,大家坐在一起,通读,讨论,分讲题,写讲稿,很快就写出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教材》,于1993年11月内部出版发行。随后又于1994年11月、12月分别出版了《学习〈邓小平文选〉(1—3卷)辅导》和《〈邓小平文选〉(第2卷)辅导教材》。1995年2月,校委主持编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大纲》出版。1996年4月,苏星、龚育之和我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央党校课堂。

1989年春天,中央党校校委为了落实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党校教学工作新布局,决定编写“三基本”(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五当代”(即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建设、当代世界思潮、当代世界法律和中国法制建设)课程教材,郑必坚常务副校长主持其事,全校几十位教师参加,我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陆续出版(后来又加了一个“当代世界民族与宗教”),先是作为党校教材,后来又成为全国干部学习教材,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001年7月12日,我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迄今已有16年。在这期间,我主要做了这几方面的事:一是在校内外讲了一些课,如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几个问题、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等等。二是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课题组主要成员;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大纲课题组首席专家。三是撰写和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编著和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四是整理、出版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稿。除在任时已出版过的文集《党的思想路线研究》外,陆续

出版了《党校教学论》(2003)、《杨春贵自选集》(2005)、《论思想方法》(2011)、《杨春贵讲稿》(2013)共四本文集。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采访者: 您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直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好吗?

杨春贵: 好的。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视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思考,重视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哲学研究,重视结合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阐述科学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的理论风格。下面我结合自己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一)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以后,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首位,并且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因此,也就成为我哲学研究的重点,我的第一本文集《党的思想路线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我对“文革”结束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过程作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思考。我认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77年2月至1978年5月,广大干部、群众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反对,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序幕,代表性著作是邓小平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次讲话。二是1978年5月至1978年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这场大讨论的策源地是中央党校,主要发动者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代表作是1978年

5月10日《理论动态》和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场大讨论得到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坚强支持,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1978年9月6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在推动大讨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三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印发全会,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新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和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内涵十分丰富。它集中体现为五个“破除”和五个“坚持”: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方法,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中每一个“破除”,都叫解放思想;每一个“坚持”,都叫实事求是。只有掌握这些方面的丰富内涵,才能深刻理解党的思想路线,并自觉地将它贯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及时而正确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可是,这篇讲话精神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特别是在“文革”中发生了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对人民内部矛盾要作具体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再认识》《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贡献》《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等论文,并与友人合作编写出版了《谈谈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

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重要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人民内部既有政治思想上的是非矛盾,又有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矛盾,还有科学上不同学派和艺术上不同风格的矛盾,等等。毛泽东强调,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不能认为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对于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的矛盾,主要应当运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同时结合以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学会运用经济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有些人民内部矛盾,由于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解决的方法应当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官僚主义者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固然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同时也需要通过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制度上去解决。至于艺术和科学中的许多是非矛盾,毛泽东说,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防止简单化。

关于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我认为应当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等,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说成是资产阶级口号而大张挞伐,是错误的;离开社会主义法治,用所谓“大民主”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更是错误的。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我认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这一学说的主要创立者和奠基者,同时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刘少奇作出了突

出贡献。我在《现代哲学》1987年第三期发表的《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贡献》一文中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刘少奇比较早地使用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概念,这主要体现在1951年他所写的《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篇笔记中。二是刘少奇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1957年4月27日他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三是刘少奇对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这主要体现在1962年5月23日他在《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他指出:“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上这些都是对我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三) 关于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问题。战略思维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现在国内外研究战略问题的著作很多,但是,研究战略思维方法的著作很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系统的研究更少。为适应干部教育的需要,在1999年第二学期,我在中央党校课堂上首次开设了《提高战略思维能力》这个讲题,一直持续到现在。结合教学,我写了《关于战略思维》《加强对全局性问题的研究》《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等论文。同时指导了五位博士研究生和一批在职研究生撰写了有关战略思维方面的毕业论文。

什么是战略思维?国内外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和成熟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我认为,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它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达到实践整体和长远的最佳效果,即全局的最佳效果。它是一切实践活动特别是复杂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思维方法。

战略思维的总要求是一切着眼全局,即把全局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为此,对工作必须有全局的谋划,不可以做事务主义者;必须以全局利益作为衡量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不可以做因小失大的事情;必须在大局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可以模棱两可、随波逐流。

战略思维应当遵循一些重要的原则。一是把握重点,即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那些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包括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中心任务,重大矛盾所决定的战略布局,关键环节所确定的工作着力点。二是统筹兼顾,即协调好各方面工作、各方面利益,优化“系统”的比例结构、顺序结构、层次结构等等。三是开阔视野,即在“系统”与“环境”的联系中研究“系统”,调动“系统”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四是照应阶段,即注意阶段之间的区别、联系和转化,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加强预见。五是抓住机遇,即多谋善断,乘势而上,去夺取胜利。

(四) 关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要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等这些重大时代课题,必须正确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四条原则。

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被长期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别的什么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教训,特别是苏东剧变的教训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是丢不得的,丢了它,共产党就丢了魂,社会主义就会丢了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救中国,而且能够发展中国。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下转8版)

